

專家為移民家庭提供健康的對策

少數族裔媒體服務機構(EMS)于6月26日邀請來自醫療、福利和健康政策等方面的四位專家與全美一百多家少數族裔媒體記者舉辦“新冠疫情(COVID-19)中移民家庭保持健康和安全的對策”視訊研討會。希望通過各族裔文字媒體向各自的社區介紹近期的疫情和有關的健康、福利政策。

四位專家分別來自合作夥伴機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副教授 Daniel Turner-Lloveras, 伊利諾伊州移民和難民聯盟衛生政策主任 Luvia Quinones, 來自 CLASA 的高級政策律師 Madison Allen, 以及來自全國移民法律中心的 Connie Choi。

Daniel Turner-Lloveras 介紹了目前美國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反彈的現狀,並介紹了相關的治療和目前美國政府公共負擔 (Public Charge Rule) 政策對新移民利用福利和醫療保險政策的影響。

他提醒繼續佩戴口罩,在公眾場所保持社交距離。發現或懷疑有類似新冠症狀出現,可利用各地政府現有的條件,立即進行檢測。

伊利諾伊州移民和難民權力聯盟衛生政策主任 Luvia Quinones 介紹了新冠疫情對少數族裔社區的影響,她希望通過各族裔文字的媒體,告知英文能力有限、暫時沒有醫療保險的新移民,所有地方政府提供的新冠檢測都是免費的。據統計,目前少數族裔、低收入和無證移民的新冠檢測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來自 CLASA 的高級政策律師 Madison Allen 介紹了新移民在新冠疫情期间可以獲得的醫療和福利項目。她表示,移民局(USCIS)曾經宣佈,新冠疫情期间,不受“公共負擔政策”對未來申請移民身份的影響。無證移民在新冠疫情期间申請相關的福利和檢測的信息不會和移民局分享。

來自全國移民法律中心的 Connie Choi 介紹了“公共負擔政策”和新冠疫情的交集,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積極為移民和少數族裔爭取支持和保護的預算。

少數族裔媒體服務機構(EMS)負責人 Sandy Close 主持了當天的會議。(AACYP)

華人學者專家談國際新語境下的“青年發展與擔當”

6月14日華盛頓/洛杉磯—“青年發展與青年擔當”國際視訊研討會,6月13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洛杉磯、北京、德國首都柏林等地同步舉行。來自主流新聞機構的資深媒體人、著名節目主持人;知名學府的教育專家、傳播學領域博士,以及來自華人青年社會創新和公益組織的十餘位學者、專家共同探討在國際新語境中,作為新時代的華人青年,如何應對挑戰,實現自我發展,承擔歷史使命,踐行時代擔當。

正在南加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與新聞學院做訪問學者的魯丹,是北京冰桶挑戰公益基金會理事長,有曾經在中國國家級媒體的從業經驗,作為資深媒體人,她在今年參與了美國民間公益機構 Life Preservation Org 向醫療機構捐贈抗疫醫療物資的新聞發佈工作,通過美國13個城市主流媒體的二十多次報導,向美國民眾介紹了該公益機構接受中國捐贈的抗疫物資,並無償向美國東、西岸多家醫療機構捐贈的故事。

全美中華青年聯合會會長、英文《洛杉磯郵報》董事任向東在主題發言中,通過介紹華裔新生代非營利組織的成長過程和經驗,提出學習當地社會的文化習俗,以開放的心態,接受新環境和新語境的挑戰。他介紹了連續多年主辦“全美年度十大華人杰出青年”與“全美年度三十位三十歲以下杰出青年”評選活動,在主流社會中形成了華人青年的知名IP。他提出華人青年的發展要注重創新,不僅是活動

形式,更需要內容創新。在國際新語境下用當地的語言和當地的闡述方式來“講好中國故事”。艱困的環境是青年展現擔當的機

不穩定;其次,語言方面的問題,這個中間有着巨大的語言輸出力差異;第三,讓世界聽懂中國的挑戰來自自身,在面對與世界溝通的時候,我們中國青年需要更多維度的思考、更開闊的思路,儘量拓展內容和修辭表達的維度,能更好的讓世界聽懂中國。

正在德國伊爾姆瑙工業大學攻讀傳播學博士的徐毅在發言中介紹了中國留學生在德國的感受,以及當地媒體的語境氛圍。

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畢業生、子知教育聯合創始人溫筠如,在總結發言中表示,“新時代中國青年要珍惜這個時代、擔負時代使命,在擔當中歷練,在盡責中成長”。作為新時代的青年,應敢於擔當、做新時代具有責任意識和創新精神的建設者。“立鴻鵠志、做奮鬥者”。

參與當天研討會的還有,子知教育創始人曾天賜、南加州大學安娜堡傳播學院傳播學博士王維、哈佛大學法學碩士譚君子、南加州大學安娜堡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王岳哈,南加州大學環境工程專業博士畢業生 Mo Chen,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會計學碩士 Maggie,南加州大學國際公共政策與管理碩士陳宜伊,中南大學機械工程研究生劉超,以及四位特約觀察嘉賓資深媒體人、教育專家、科技企業教育部門高管等。

當天的研討會由子知教育發起主辦,全美中華青年聯合會、“只為你進步”基金會、青藤國際組織等機構參與合作支持。(AACYP)



會,他表示將繼續致力將華人青年對美國社會的貢獻展現給公眾,他帶領的團隊正在籌備全美華人青年院士的遴選活動(AACYF Junior Fellow)。

知名主持人、中美關係國際問題專家王冠結合他專訪全球近百位政、商、學界領袖的經歷,在發言中表示,“讓世界聽懂中國”要接受三個方面的挑戰:國際政治環境

“模範少數民族”的帽子,亞裔要不要戴下去?

俄州亞太聯盟

亞裔被稱為模範少數民族,我認為總體來說不是一件壞事。我們勤勞肯幹,獨立自強,遵紀守法,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移民來到的這個新國家一磚一石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園,很多人都躋身中產階級的行列,也能為孩子提供比較富足的生活和比較充裕的機會。我們應該為自己的成就自豪,稱我們為“模範少數民族”,是對我們的一種肯定。

但最近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跪頸致死事件及其引發的抗議,讓種族歧視成為很多對話的中心議題,我在這個過程中對亞裔的模範少數民族身份有了更多瞭解,也生出更複雜的感受。

1. “模範少數民族”的起源

“模範少數民族”的說法出現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1966年1月,社會學家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成功故事:日裔美國人的風格”(Success Story: Japanese American Style)的文章,第一次稱日裔美國人為模範少數民族,同年晚些時候《美國新聞和世界導報》上也有一篇關於華裔美國人的類似文章。彼得森開篇就說:

如果被問到我們國家的哪個少數民族遭受了最大的歧視和最不公正的待遇,幾乎沒有人會想到回答:“日裔美國人”。但如果這個問題是指今天還活着的人,這很可能是正確的答案。

接下來彼得森簡略地描述了日裔美國人的窘境:

像黑人一樣,日本人一直是膚色偏見的對象。像猶太人一樣,他們作為高效率的競爭對手被恐懼和憎恨。他們比其他任何群體都更被視為海外敵人的代理。保守派、自由派、激進派、當地警察、聯邦政府、最高法院都攜起手來剝奪他們的基本權利,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被撤離到拘留營地。

一般來說,彼得森指出,這樣的對待都會製造出所謂“問題少數民族”,但日本人沒有成為“問題少數民族”;恰恰相反,他們成了“模範少數民族”。

彼得森在文章中詳細描述了日裔美國人的勤懇努力,在社會留給他們的狹小空間中的隱忍、奮鬥,以及他們取得的成就:他們的青少年犯罪率低,他們的收入在社會平均水平之上,他們受教育的年份在美國各民族中最高,他們有比較長的平均壽命。

最後,彼得森分析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把日裔美國人的成功歸功於重視家庭價值觀和職業道德的日本文化。

彼得森這篇文章的主角是日裔而不是華裔,閱讀時我可以假裝這篇文章與我無關,但讀完還是五味雜陳,百感交集。我知道很多亞裔反感“模範少數民族”的提法,但這篇文章第一次讓我對這種反感有了發自肺腑的感同身受。

其實彼得森的語調很平和,闡述的也是事實;當他把日裔美國人的“模範”歸功於日本文化時,他也並不是全無道理;但他對日裔美國人

的優秀嘖嘖稱奇的時候,我一眼看到的卻是日裔美國人的“模範”背後的無奈和辛酸,和他對此的忽視和淡漠。

為什麼日裔和華裔美國人是模範少數民族?不是因為他們在收入、教育、健康、犯罪率各方面表現和白人差不多,而是因為這些成就是在不公平待遇中取得的;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在歧視和不公面前,高風亮節地展現了一種

逆來順受、忍辱負重、不給社會添亂的感人態度。

亞裔美國人自律到什么程度呢?在七十年代的紐約市,有15%的華裔收入在貧困線之下,但只有3.4%領取社會福利。

這樣的行為,當然要積極鼓勵,發揚光大,最好號召其他少數民族向他們學習,好像在小學里給乖孩子戴小紅花。事實上,這正是當時把亞裔樹立為模範少數民族的用意之一,即向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群體傳遞一個信息:人家受的歧視不比你們少,吃的苦比你們還多,可是人家不遊行暴亂,不怨天尤人,而是咬緊牙關,埋頭苦幹,實現了美國夢。他們是你們學習的榜樣。

但如果這是為非裔美國人樹榜樣,這個榜樣顯然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大部分非裔沒注意到我們的小紅花,注意到也嗤之以鼻。撇開各種族的獨特歷史不談,你願意含辛茹苦忍氣吞聲是你的自由;別人沒義務學你的樣,外人也不能要求別人學你的樣。

2. 印第安人不必走上“血淚之路”

五十年後,美國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種族歧視的法律被推翻,社會對種族問題更敏感,至少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我們的“模範少數民族”的帽子還是穩穩地戴着。這可能表明我們保持了勤勤懇懇、刻苦努力的優良傳統,但也表明我們在社會上仍然處於戴小紅花的小學生的位置。

讓我們做一個思想實驗。如果我們不是處於社會邊緣的少數民族,而是社會的中堅和主流,什麼行為更模範?是循規蹈矩,遵紀守法,還是保證社會公平,推動社會進步?

答案當然是後者。這幾天正好在讀一篇關於“血淚之路”(Trail of Tears)的文章,對這一點有了更深的體會。“血淚之路”的故事本身非常悲慘,印第安人被迫從美國東南部遷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不但放棄了祖祖輩輩居住的家園,

而且在路上挨餓受凍,死傷無數。

更讓我感慨的,是這種強制性人口遷移是完全合法的,而它的合法性是完全可能被制止的。自從歐洲殖民者來到新大陸,就一直強迫印第安人接受自己的習俗和生活方式。印第安人雖不情願,權衡利弊後勉強答應了。因此他們與殖民者和平共存,政客們也一直吹噓這是自己的政績和成就。

但印第安人控制着密西西比河以東數百萬英畝土地,其中有些是美洲大陸最肥沃的,有些富裕的印第安人擁有數千名黑人奴隸。這讓一些殖民者眼紅。他們覺得這些財富本該屬於自己。但印第安人目前的處境是殖民者強加給他們的,再把他們趕走,還要有新的藉口。

殖民者眼珠一轉,計上心來,編了個故事:印第安人口這些年減少了,只有向西遷移,和殖民者切割,才能免于逐漸消亡的命運。以這個與現實相反的“另類事實”為基礎,1829年安德魯·杰克遜就任總統後,幾個月內就提出了印第安人驅逐法案。

法案引起了嘩然,國家支持的對土著的大規模驅逐是與美國標榜的文明背道而馳的。印第安人出版小冊子,派外交官到華盛頓斡旋,白人傳教士撰寫激昂慷慨的社論,很多婦女挨家挨戶請願。但從驅逐印第安人中獲利的人佔了上風,最後眾議院以102對97的微弱多數通過了驅逐法案。

驅逐印第安人的序幕被拉開。下面發生的事情每個美國小學生都從歷史課上讀到了:印第安人被送上了悲慘的“血淚之路”。

美國國父當年深謀遠慮,建立起一套比較合理的制度,但它的歷史上有過很多黑暗的時刻。奴隸制,對印第安人的殺戮和驅趕,對亞裔的壓迫和歧視,都是美國歷史上的污點。是那些看到社會不公的人,以發聲、抗議、參政、立法的方式,阻止惡行(雖然不一定每次都成功),推動社會的改變和進步,讓美國變成了一個比兩百年前更好的國家。連美國憲法都有27條修正案,其他法律上的改變更是不計其數。

3. 兩種不同的人生哲學

過好自己的小日子當然也是一種為社會作貢獻的方式,好過浪費社會資源,成為社會的負擔。不是每個人都有改變社會的能力和野心。但滿足於遵守規則,卻不認為自己有能力

和責任制定規則的心態,不光導致我們對社會無法做出更大貢獻,對個人生活也有影響。

比如為什麼我們在職場會遇到玻璃天花板?或許職場確實存在歧視,但是不是我們自己也從來就沒有升到上層參與制定遊戲規則的習慣和勇氣?

比如為什麼我們熱衷於爬藤,把上好大學當成人生最大的追求?是不是我們腦子裡只能想象出年輕一代在美麗的校園、整潔的課堂學習的情景,卻不能想象他們在社會上叱咤風雲的畫面,不敢對他們有更大抱負?

當然這些年我們有一些進步。我們有時候會採取行動為自己爭權益,比如反對亞裔細分,狀告哈佛;有一些華裔會站出來競選公職,比如前不久競選總統的楊安澤。這些人和事,只要不是跟自己的理念太相左,哪怕僅僅是因為物以稀為貴,我都支持擁護。

一個人如何在社會上發展,有兩種不同的哲學。一種是看重自我提陞,着眼于在現有體制下最大限度地完善自己;另一種是注重於修正體制的不合理之處,認為這才是阻礙個人充分發展的關鍵。前者注重的是內因,後者注重的是外因。《紐約時報》中文網上一篇題為《你和非裔站在一起:兩代華人的種族歧視大辯論》的文章(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對這兩種模式做了很好的總結:

這兩種模式走到極致都將遭遇無法突破的瓶頸——太過遵守遊戲規則最終總會面對遊戲中預先設計好的玻璃天花板,告訴你在這個層面之後的成功,無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屬於你。而一味強調體制的不公,就容易讓人忘記即使在這個錯漏百出的體制里也仍然存在的個人發展空間,容易讓人把體制的徹底改善當成實現自己價值的唯一途徑,繼而在社會進步太過緩慢時怨天尤人、自暴自棄。如今美國面臨的眾多社會問題,或多或少都反映出了這兩種模式各自的死角。

在討論非裔美國人受到的種族歧視時,有些華裔有一種看法,就是非裔固然受到了系統性的歧視,但如果他們更加注重新個人努力,也有助於他們的境況得到改善。這種觀點是否正確見仁見智,但也正好為上文提到的兩種模式提供了一條旁注。

人家的事情暫不管它,在這兩種模式中,模範少數民族屬於前者,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世界上大部分事情都是一個“度”的問題,最難做到的就是拿捏分寸,掌握平衡。但在個人努力和制定規則的角力中,我們華人並沒有處在一個很難掌握平衡的位置,我們完全走了極端:逆來順受、致力於自我提陞一直是我們的主打理念。

因為這個原因,如果我們華一代和華二代之間的衝突,確如《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文章所說,是這兩種態度的交鋒,我以為是好消息,因為這表明我們的下一代已經躍躍欲試地想摘下“模範少數民族”的帽子,我們這個社區的心態,正在向一個更平衡、更健康的中心點移動。

